

SOCIOLOGICAL MASTER DEGREE PAPERS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2016

(第14辑)

北大清华人大 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郭星华 卢晖临 沈 原 编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2016

(第14辑)

北大清华人大 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郭星华 卢晖临 沈原 编

SOCIOLOGICAL MASTER DEGREE PAPERS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2016 / 郭星华, 卢晖临, 沈原编. —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177-0613-7

I. ①北… II. ①郭… ②卢… ③沈… III. ①社会学—文集 IV. ①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6806号

书 名: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2016

著作责任者: 郭星华 卢晖临 沈原 编

责任编辑: 孙 勇

装帧设计: 北京中源太行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16号8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77-0613-7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370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联系电话: (010) 88913231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络订购: <http://zgfczchbs.tmall.com/>

网购电话: (010) 68990639 88333349

本社网址: <http://www.develpress.com.cn>

电子邮件: sunyongcdp@126.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目 录

前 言	1
-----------	---

陈雪松

“打赙”中的“义”“利”整合

——团结经济理论视角下对村民资金互助合作的研究	3
-------------------------------	---

刘华章

“拔青苗”群体的口述史研究	55
---------------------	----

娄 琦

分化、整合与区隔：高科技外企中的职业性别逻辑	109
------------------------------	-----

倘凌越

弱者抗争与符号生产

——以广州市环卫工停工维权为例	160
-----------------------	-----

许 瑞

城市消费空间中的消费者自我区隔及其机制分析

——基于H市购物中心的研究	214
---------------------	-----

张 龙

社会学“南开班”（1981-1982）	258
---------------------------	-----

张耀民

科技组织对临时性劳动力的技术控制

——北京地区网约车平台Uber“合作车主”的案例研究..... 311

周 航

抗争是否发生？

——对二甲苯（PX）项目集体抗争影响因素的定性比较分析.... 363

三系2016年硕士论文题目汇总..... 413

前言

从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到今天的繁荣发展，已经过去三十七年了。期间，有众多的拓荒者、引领者，如费孝通、雷洁琼、袁方、陆学艺、郑杭生等老前辈，他们为社会学独立的学科地位、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理论创新而呕心沥血、奔走呼号并且身体力行。除了这些名流、巨擘，在社会学发展的历程中，还有一些人，他们在做好自己的教学与研究的同时，也在为提升教学质量、规范学科研究、扩大学科影响而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以下简称“三校论文集”），就是其中一朵璀璨的小花，她从当初的籍籍无名、暗香自赏，已经到了今天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成为众多导师指导学生撰写论文的重要参考文献，也成了学子们完成学位论文的模板，什么是好的研究，什么是好的论文，一目了然。“三校论文集”，只是一种民间行为，没有课题资助，没有经费来源，对编辑者来说，也没有任何报酬，完全是凭着对学科的热爱、对一种信念的坚守才能一路坚持下来的。从2003年到今年，每年一集，出版了13集，其中的艰辛、困苦只有局中人才能体味。要从三校每年百余篇硕士论文中挑选优秀者入选，编辑、出版、发行，均是亲力亲为，确实不易，没有一点对学术抱着宗教般的狂热是难以做到的。说到这里，我必须要对“三校论文集”的三位创始人表达我的敬意，他们是：北大的郑也夫教授、清华的沈原教授、人大的潘绥铭教授。

他们三位教授，都术业有专攻、名满学界。郑老师，对信任问题有独到的研究；沈老师，长期专注于劳动社会学的研究；潘老师，在性社会学研究方面独树一帜。郑也夫、沈原、潘绥铭三位教授都是50后，先是人大的潘老师退休，替补上场的我还是50后（1957年出生）。北大的郑老师退休后补上卢晖临，终于有了60后的人参与编辑

“三校论文集”。等到明年（2017年），沈老师和我都将辞去编辑工作，编辑队伍将完成从50后到60后、70后乃至80后的华丽转身。

一个“老炮儿”的时代就这样谢幕了。

说起“老炮儿”，郑沈潘三位老师虽然性格各异，但还真都有点“老炮儿”的劲儿：有担当精神，敢仗义执言，有侠士风骨。由于三位老师都是成长于京城，还都有点北京“爷们儿”的范儿：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叫事，那种处乱不惊、淡定自若的范儿，那种不管身处何种境遇都在放眼世界、忧国忧民的范儿，像我等操着外地口音的京城人是学都学不来的。

最后，谈一谈对“三校论文集”的一点个人评价。在我看来，该文集未必囊括了年度所有论文中的优秀硕士论文，但是，我敢说，入选的论文都称得上是当年论文中的优秀者，代表了三校硕士论文中的最高水准。敢这么说，是因为编选者的眼光是严苛与挑剔的，不讲情面、不讲平衡，只有一个标准：学术水准，其他一概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当然，三位老师之间有时也会有分歧，甚至有争议，但标准从来没有改变过。依我参加三届编选工作来看，入选的标准有四条，我称之为“四有论文”：有材料、有理论、有观点、有规范。其他三条好理解，着重说说“有材料”。这里的材料，主要是指作者收集的第一手经验材料，依据文献资料或第二手的统计资料撰写的论文，除非特别特别出众，一般很难入选。虽然对此我有些不同看法，但我还是能理解创始人的初心：鼓励脚踏实地的学风，提倡扎实田野调查的态度。想想我国早期的社会学家，潘光旦、严景耀、李景汉、费孝通等等，哪个不是在田野中摸爬滚打过？只有掌握了来自基层、来自生活的鲜活资料，才能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当下社会。

好了，就说这么多。期待三校论文集越办越好。

人人都是过客，只是我太过匆匆。

郭星华

2016年7月25日

“打𧈧”中的“义”“利”整合

——团结经济理论视角下对村民资金互助合作的研究

陈雪松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4级

指导教师 马凤芝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缘起

在笔者家乡大理地区广泛存在着一种民间资金流转行为，在当地土话中人们将之称为“打虫”（但实际上是对𧈧 cóng 音的异读）。我对于打𧈧的印象源自于儿时家中父母参与打𧈧的记忆，那时家中遇到资金困难，就去打𧈧。若干年后父亲谈及此事时总还是说“穷人有穷办法，大家一起筹点钱日子就过去了”。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家乡也有了完善的农村信用社，但要取得信用社的贷款需要一套复杂的程序和信用担保，因而“打𧈧”仍然是当人们遇到手头资金周转不开、解决资金需求时的常用方法，打𧈧在我家乡人的经济生活中仍然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然而真正激发我研究欲望的是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背景，社会工作强调“助人自助”，助人的最终目的是使受助者达到“自助”。费孝通先生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对此有过记载：云南乡下有一种称上𧈧的钱会，是一种信用互助组织（费孝通，1986，76）。打𧈧从某一层面来说就是一种民间的资金互助行为，是一种民间非正式互助行为。虽然打𧈧的最初目的是否为“互助”需要具体分析，但不可否认，在这一过程中，“互助”和“资金需求的满足”是客观存

在的。基于上述的观察、体验和思考，我将打踪这一具有乡土色彩的社会事实作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问题

打踪，从形式上来看，最简单的描述便是定期的集体资金合作行为，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踪是一种信用互助组织。在农村“合作”并不少见，然而人们为何选择打踪解决日常生活中在资金上的困难，对他们有何意义？对此，本研究力图回答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A 踪会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踪头和踪员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区别？成员之间关系是什么样的？踪会是如何运转，又具备了什么样的功能？

第二，打踪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功能？踪会背后的运行机制是怎样的？人们在踪会背后持有怎样的态度和认识？

第三，打踪作为一种村民之间的经济合作行为，发挥了什么功能？这种功能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合作机制？对于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具有怎样的意义？

三、理论视角

团结经济 (solidarity economy)，又称为社会经济。社会经济强调社会团结和整合，强调为社会大众和社会环境服务。团结经济更像一种理念，它是一个开放和变动的概念，它可以将合作主义置于一个更广泛、更有政治意义的、建立不同的经济模式的视野之中 (伊桑·米勒，2012)。团结经济实践包括生产者合作社、消费者合作社、公平贸易、社会企业、小区货币、良心消费、集体购买、小区支持农业、小区内生性经济、内置金融、集体所有制经济等等 (潘毅、陈凤仪、阮耀启，2012)。然而团结经济的内核却又是统一的。从一种核心信仰出发——人们是非常有创造性的，有能力自己找到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背景下，这些办法看上去会不同——团结经济试图展示已经存在以及刚刚萌芽的替代性经济方案，用相互支持的方式把他们连接起来 (伊桑·米勒，2012)。经济发展的最终目

的是为了人更好的生活，社会经济正是基于这一基本的理念，强调多元文化视野下，各种社会力量主导的经济形式，通过它们人们可以得到更加有效的整合和价值提升。团结的理念确定了一种特定的关系模式：我们的生活和命运是与许许多多其他人的生活 and 命运捆绑在一起的（伊桑·米勒，2012）。

团结经济是一种人文主义经济（humanist economy），它协调金钱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信赖民主商议（埃里克·达舍、丹尼尔·古戎，2012）。正如赖特（Wright）所指出，团结经济的特点是集体组织生产，直接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不是服从利润最大化或国家 - 技术官僚的理性逻辑（埃里克·欧林·赖特，2012）。团结经济并非不注重经济效益，而是将产品、利润和资本等问题放到了社会结构之后，以期通过经济实践重建社会结构和原则。根据欧洲社会经济联盟（Social Economy Europe）所倡议的《社会经济原则宪章》，要求社会经济运动的内部守则包括以下七点：第一，重视个人及社会目标高于资本与利润；第二，成员的参与必须是开放而自愿的；第三，重视社会持份者的参与、由成员民主管理；第四，业务的营运不仅照顾组织成员和服务用户的利益，并同时关注公众利益；第五，维护并着力实践社群之间的团结精神及相互守责的基本原则；第六，独立于公营部门，实行自主管理；第七，盈余的分配大部分用于维持永续发展的目标、服务成员的利益，以及照顾公众利益（潘毅、陈凤仪、阮耀启，2012）。透过这些原则，不难发现团结经济具有的经济 - 社会整体视野，可以看到团结经济作为社会运动的价值追求就是人的发展。

目前，在中国内地有关团结经济的研究不多，但是从已有的研究中能够看出，团结经济由于其文化性、多元性和人文性在中国有光明的实践前景。李长江等人对周家庄合作社的研究表明，合作社能够成为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替代物的社会经济的一种可能尝试（潘毅等，2004，114-117）。刘亚通过对香港理工大学“珠三角农村社区设计和社会经济建立”项目在崖口村的实践研究表明，社会经济项目的开展促进社会的有机团结，凝聚社区共同体意识，

重新将经济发展嵌入社会关系（潘毅等，2004，135）。山西永济市蒲州果品协会社会经济的案例则表明一种“内外循环”社区经济的可能性（潘毅等，2004，149）。云南平寨的合作经济经验则表明经济的增长与村民能力建设和赋权相互促进的可能性（潘毅等，2004，183-189）。通过上述研究不难发现，社会经济的目的不是单一地追求经济的增长，而是强调社会关系、社会团结、社会联结等的发展，从中获得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使得社会经济回归到服务于人的发展的根本议题上来。

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人们对于彼此之间关系的强调，对于“我们”这一整体利益的强调都吻合了团结经济对社会团结的内核。透过团结经济的相关文献，能够更加理解村民的资金互助合作不单单是存在于资金方面，更加存在于彼此之间的联结和关系。在团结经济中可以看到人的发展、看到合作、看到社会团结。从团结经济的角度去观察“打踪”活动，可以为团结经济实践提供中国本土内生的经验，亦可以了解到团结经济在乡土文化中运行的基本逻辑和功能。

四、研究方法

1. 质性研究

关于质性研究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明确的定义。袁方从描述的角度指出定性研究方法不对不同单位的特征做数量上的比较和统计分析，它只是对观察资料进行归纳、分类、比较，进而对某个或某类现象的性质和特征做出概括（袁方，2012，145）。陈向明提出“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的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陈向明，2014，12）。质性研究区别于定量研究的主要原因，不仅仅在于对数据和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更在于方法论上的差异。定量研究是一种专家式的由上而下的研究路径，定量研究的思路是一种因果取向的线性思维。而质性研究更加强调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将研究对象放置在更为广阔的背景和视野中去理解，从而归纳总结建

构理论的由下至上的路径。

质性研究的重点是理解特定社会情境下的社会实践，而不是对类似事件类似情形进行推论（陈向明，2014，8）。以定量为特征的研究方法试图通过数据、模型的建构解释一般的人类行为，这背后是以“宏大叙述”为特征的思想发展模式，追求“代表性”和“普适性”，更是对自然科学的一种“趋同”。然而，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研究者逐渐意识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差异性，更反思到“宏大叙事”的定量研究，忽略了少数群体的声音，客观上排斥和忽略了弱势群体的话语力量。因此，质性研究强调“被研究者的内部世界”的视角，强调研究者的“投入式理解”，注重对研究对象的现实生活经验的考察，着重对被研究者“默会知识”的理解。每一个人对自己所处的世界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解方式，同样一群人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意思世界，但是往往不能完全加以说明，大量的“默会知识”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诠释主义者指出知识是社会性与历史性的产物，而“事实”来到我们面前时，都是负载理论的（Matthew B. Miles、A. Michael Huberman，2013，6）。

打踪作为一种社会实在（social reality），是在特定的文化社会环境中产生和维持并得以发展的。后现代主义强调所有的知识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 and 情景，脱离了综合背景（contextuality）的理解和认知是无意义的。因此所有的语言本质上都是在一种有机背景之下的话语（discourse）和文本（text），透过这些文本我们能够看到蕴藏在语言背后丰富的文化层次、社会结构和行动关系。要想充分认识打踪，就必须对打踪进行“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一种“显微性”地叙述和描写——以达致对其行为尽可能地还原。“描写”不是“深度描写”的题中之义，最重要的还是通过“描写”来“阐释”。

建构主义是质性研究的重要理论范式之一。建构主义认为社会事实不是客观的、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就是人们根据不同的历史、社会、地理、经验等因素建构起来的。建构一个互为主体的理解。建构主义认为完全的价值无涉是不可能的，研究者看待事物的角度和价值决定了其解释的取向。因此要求研究者在研究

过程中不单单是站在研究者的角度看问题，还要站在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中解读问题，更重要的是强调通过互动和反思，领会不同主体视角中的“事实”。因而陈向明认为，研究者在质性研究中是重要的研究工具，质性研究就是研究者将自己作为工具，与研究对象一起意义建构的过程。平等、赋权一直是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追求，质性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要求在社会工作研究价值上达到了一致性。

2. 研究对象

现实生活中，打麻将往往会演化为恶性的集资事件，就这一问题需要更多地从法律、经济和越轨社会学角度进行讨论。为了更好地理解打麻将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功能和作用，笔者将研究对象集中在规模较小（10—20人左右），月供金额低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大约3000元），利息相对较低的麻将会。需要澄清的是，虽然在当地人口中打麻将是一个大概念，它包括了群体之间的资金借贷和非法集资等有相似点但却性质不同的团体形式。邱建新在对崇川镇“标会”的研究中指出了非法集资的主要特点：由于标会本身并不会使轮转资金增值，因此只能靠高额利息造成赚钱假象骗取更多人入会，以连锁累进的方式发展会员；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出现了职业会头群体，形成了从大会头、中会头、小会头和散户的四重金字塔结构；同时处于结构洞位置的强关系成员会变成会头与会员之间的“中介人”，脆弱的关系链会因为中介人的失信而断裂（邱建新，2005，67—80）。由此可见，打麻将与非法集资等现象在外显特征上有着高度相似性，然而具体运作方式、价值等却有本质的差别。因此采用这一定义主要是出于三个考虑。第一，集资行为往往由于其资金链需求而不断扩大，反过来由于参与人数过多也客观加重了其对资金的需求，如此循环，促使这样的组织有不断扩大的态势。第二，集资行为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往往报以高投入高回报，且有很多“闲钱”投入其中的家庭对打麻将的需求显得“微不足道”。第三，追逐高利益回报，超高的利益回报是集资行为的最重要标签。

本研究访谈15人，其中包括共同参与“A麻将会”的11人，参与

打踪但是未参与该踪的相关人员 2 人, 未参与打踪 2 人^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本研究中的所有受访者互相之间都是熟悉的、有社会往来的, 换言之, 他们都共处于同一生活圈中。

3. 资料收集方式

为了更好地观察和研究打踪现象, 我以局内人的身份, 依靠自己在当地的社会关系, 进入到 A 踪会中, 对参与打踪的人进行观察和访谈。本研究主要采取参与式观察和无结构访谈两种方式收集相关资料。参与式观察是指研究者作为一个参与者参与到研究对象的活动中去, 在自然状态下对研究对象展开研究。选择“作为参与者的观察者”作为介入的角色, 其主要特征在于, 被研究对象是知道研究者身份和目的的。由于有 A 踪会中的踪头和重要骨干作为“担保”, 有效地解决了我在收集资料过程中会遇到的信任问题。因此踪会的参与者会更加真实地向我表达他们的态度和动机。无结构访谈是相较于结构化访谈而言的, 不预设一个标准的提问程序, 只给定一个题目, 受访者和研究者就这个题目自由交谈。无结构访谈能够有效凸显研究对象多层次的社会行动背景, 当受访者谈话内容指向某些方面时, 更能凸显共同的意义或价值。

五、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社会工作知识本土建构

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本土知识建构。马凤芝指出, 大陆社会工作学界注重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讨论, 忽略对本土社会工作资源的总结与发掘, 包括制度与结构资源、社会价值资源、理论和实务知识(马凤芝, 2010, 10)。首先, 社会工作知识是需要建构的。社会工作的知识基础来自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系和人类学等学科, 也来自于对于实务工作的总结和提升。大卫·豪将社会工作理论在逻辑结构

^① 受访者编码规则如下: “C”表示本研究所涉及踪会; “R”表示有打踪经历(现在也在打踪), 但是不属于本研究所涉及踪会; “N”表示从未参加过打踪; “T”表示在打踪中承担的角色为踪头; “Y”表示踪会中的一般成员。数字表示的是访谈的顺序, 举例来说: “RT01”表示的是在本研究所涉及踪会外的踪头。

上分为“为社会工作的理论”(theory for social work)和“社会工作的理论”(theory of social work)。孙立亚认为社会工作专业在借用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同时,并不是简单的挪用,而是根据社会工作专业目标的要求和解决实际中的社会问题和需要,在社会工作专业范畴体系中将不同理论和方法组织在一起,形成社会工作专业自己的理论体系(孙立亚,1999,155)。可以说这一过程就是社会工作知识建构的过程,其中融合了专业要求、文化因素、情境特点等。其次,本土知识建构就是要发展出一套既包括各国社会工作的一般特性又能反映我国社会工作本土特色的中国化社会工作理论(王思斌,2010,72)。这就要求运用社会工作专业视角观察中国社会原有的助人方式和文化元素,从中提取理论要素,搭建本土化的知识体系。打䟽长期存在于当地村民的经济社会生活中,面对剧烈的社会变迁,打䟽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具有生命力。这就说明打䟽这种村民中的经济互助形式蕴含了存在的合理性和自助互助的知识,对这些知识的提炼和总结能够促进社会工作知识的本土建构。现行有关团结经济的实践和研究基本都是在合作社、集体经济、社区经济等之类的组织中,这一类组织的显著特点是需要有人刻意组织,甚至需要学习境外相关经验。然而打䟽是一种地区文化遗产的习惯,它是本土社会中的传统经验。从打䟽中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合作经济形式和经验,可以弥补团结经济研究中本土资源挖掘的不足。

2. 实践意义:对精准扶贫的启示意义

贫穷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悲剧,尽管对贫穷的定义不一而足,但“没钱”都是贫困的核心特征之一。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应对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贫困的手段而出现,可以说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始终关注着贫困问题,2016年第十届国际社工日的中国主题是“发展社会工作,助力扶贫济困”。精准扶贫,作为现阶段国家层面的宏观战略,目前已经成为政府各层级和社会广泛关注、讨论的议题。目前学界尚未对此有统一定义,在官方话语体系中主要特质体现在“精准”二字之中,可以简单的将其理解为找准贫穷根,用准脱贫药。但是在基层,由于没有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案例,加之政策的自由裁量空间过

大，很多工作的开展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打棕作为一种民间资金流转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人们对资金的需求。作为一种民间长期存在的“地方性知识”，是人们在资金缺乏时互济互助的一种方式，具有很强的文化适应能力和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有关助人实践的本土知识。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以帮助弱势群体为目标的专业，能够在精准扶贫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首先，能进一步探究存在于原有的社会互助网络中的、能够被用于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中的实践要素。其次，能够为研究提供一个对“人在情景中”的视角，透过这个视角能够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激荡中的民间互助行为，为本土社会工作知识提供经验材料。

第二章 文献研究

本章将通过互助会、民间互助、传统义利观、社群主义几个主题展开文献研究，通过这些观点认识和了解打棕现象。

一、互助会

棕，又做“竇”，据《汉语大词典》解释：秦汉时西南少数民族巴人称其所交纳赋税为棕。根据字典的解释，棕在本意上是一种定期上缴的赋税。人们根据日常生活形式，仿照上棕的形式，把对官方的关系转化为民间的自我形式，自发组织了棕，每人凑出一定的资金，轮流供凑集人使用（习煜华，1994）。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纳西族“化棕”现象。组建棕的范围限于由天灾人祸引起的困难者和计划置办家产者，并且棕作为民间结社得以长期流行主要在于迎合了纳西族从血缘到地缘的社会组织过程、满足了从游牧狩猎转入农耕的生产方式、契合了向往团结追求和谐的文化基础和中心地理位置带来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习煜华，1994）。进入21世纪，化棕成为丽江古城纳西人最普遍的一种休闲娱乐的生活方式，更成为纳

西人最重要的一种人际交往模式，这种对化踪现代性应有的转变来自于对传统文化的自觉，化踪在保持金融储蓄互助的原始风貌前提下，强化了对社会结构内部人际关系网络的重建和巩固，同时适应新的社会交往变化（和立勇、和少英，2007）。何秀涓通过问卷形式发现化踪的形式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由原来的结构严谨到结构松散的变化过程，并认为经济互助功能的减弱，社会支持功能、文化功能、闲暇功能的凸显则是导致化踪形式非结构性变迁趋势的根本原因（和秀涓，2011）。通过对化踪的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到踪是一种具有民族文化特性的民间经济互助组织，踪在许多民族当中也有流行，称踪会、钱会等（习煜华，1994）。

不论钱会、标会或踪会等都是互助会的一种形式。互助会是一种民间非正式的经济互助组织，认为其是非正式的，主要是区别于银监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的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①。我国民间社会针对其有不同的称呼，例如标会、钱会、合会等，不同的称呼意味着互助会在运转形式上的些许不同。在国际学术研究中，互助会被形象地称为轮转储蓄和信用互助协会（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 简称 Rosacs）。互助会一般由发起人（会首）邀请若干人（会脚，或会员）参加，约定时间按期举行，每次收集一定数量的会金，轮流交由一人使用借以互助，资金使用顺序会依照互助会内部共识商定。目前针对互助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和功能分析层面，社会学、人类学等主要揭示了互助会的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功能——增强团体凝聚力、监督约束和文化遗产（董研，2013），而经济学、法学主要揭示了互助会维系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议题。总的来说，对于互助会的认识还比较碎片化。

互助会的存在与民间的文化习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有研究指出互助会已经作为一种习俗，它的根基已经深深扎到当地的整个社会系统之中，并且标会将自由竞标过程与程序、竞争性利率决定、自愿

① 其定义为：农村资金互助社未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乡（镇）、行政村农民和农村小企业自愿入股组成，为社员提供存款、贷款、结算等业务的社区互助性银行业金融机构。